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组织工作

李连清 主编

SHEHUIZHUYI

SHICHANGJINGJIYU

ZUZHI GONGZUO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主 编 李连清
副主编 凌云樾 吕宪明
耿英侠 丁庆林
李东玮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福威	王毅人
朱德镇	杜宝林
张祥君	张瑞昌
孟庆礼	侯求忠
姜德君	袁炳芳
黄金本	

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积极探索 大胆实践

(序)

童 明 英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制定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胜利迈向21世纪的宏伟纲领，从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上树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14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就举世瞩目，这是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

马克思主义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确立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彻底抛弃计划经济体制，坚决转向市场经济体制，首先要解放思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

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要摆脱姓“社”还是姓“资”的困扰，从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大胆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

任何一个重大的改革举措，除了给人们思想观念带来巨大冲击和转变之外，都要给各项工作带来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政治体制要与经济体制相适应，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中的组织工作，更应该做相应的转变和加强。如果说，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是一次重大的变革，那么，如何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如何改进党的组织工作，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可靠的组织保证，则是对组织工作的一次严峻的考验。能否顺利实现这些转变，关系到党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

如何使新时期党的组织工作尽快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从理论到实践，都有许多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在理论上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大胆创造，力求有新的建树；在实践上要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实际大胆探索，努力寻找新的办法，积累新的经验，圆满地完成新时期组织工作的各项任务，真正把党的组织建设好。

1993年3月

目 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历史选择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27)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	(47)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及有效控制	(5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	(7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培育	(99)
新时期党的组织工作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 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116)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使党的组织工作面临 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134)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确立党的组织工 作的思路 and 任务	(153)
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加快干部制度改革	(170)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努力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 与组织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186)
切实搞好干部培训, 全面提高干部素质	(205)
一手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一手抓党的 基层组织建设	(222)
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充分发挥党员在发展市场经济 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250)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努力做好新时期知识分子 工作	(265)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目标的历史选择

我们从哪里来？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来。

我们到哪里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去。

1992年10月12日，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上庄严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的旗帜上第一次写上的“市场经济”4个大字，中国经济体制将全面走向市场经济。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不是谁的主观意志的自由选择，而是郑重客观的历史选择，让我们翻开尚未尘封的历史文献，寻找这一认识形成的历史轨迹！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是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

传统的社会主义学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经设想：在公有制的条件下，“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社会劳动”。“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支配，这一切东西，所以同现在实行的大工业制度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将首先被消灭”（《马恩选集》第2卷454页）。这就是说，整个社会生产将按照代表社

会的中央计划机关预先制定的计划来进行。

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把这种思想具体化。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党纲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共同体，为自己的消费而进行共同的生产，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社会不外乎是一个单一的大生产企业，每一个生产单位，不过是其中一个车间，一个班组，它们都根据厂部所订的计划来生产和交换。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著作中写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全体人民都成为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

马克思曾设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未来的新社会，最终将走向统一的全社会公有制，因而商品经济也将随之消亡。但是，这是他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状况，运用抽象方法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所作的预测。马克思从来不对这种发展的具体进程进行空想主义的描述，而把它留给后人的实践来回答。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性普遍估计不足，并且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想按照现成的公式来构筑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十月革命后，俄国共产党就按照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设想建立了自己的经济体制。其间，在战时的共产主义体制造成巨大的经济困难之后，列宁很快觉察到这是错误的，果断地实行新经济政策，“转向市场经济形式”。但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暂时的退却，所以在经济得到恢复以后，就重新按照原来的计划经济的模式来建设社

会主义。斯大林建立起来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同的是，对先前的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计划经济只作了一点很小的修正，即增加了一点物质刺激的因素，在企业里实行经济核算制，根据完成计划指标的情况，给企业和劳动者适当的物质奖惩。虽然引进了一点市场因素，但是它的基本框架并没有变，仍然是以预定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式的计划管理体制。不能否认，这个体制在开始建立起来的一段时间里，显得很有成效。在卫国战争前的紧急状态下和战后恢复时期里，苏联依靠这一体制，很快建立起自己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保证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二次大战以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当时只能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作为过渡的直接目标，在各自的国家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战后初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处在世界的前列，超过当时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50年代后期，苏、东国家出现了增长率下降，效益降低，经济发展缓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差距愈来愈大的趋势。于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各国程度不同地提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要求。这时，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已经运行了三十多年，在东欧各国也有了十多年的历史，这使社会主义者有足够的事实来证明这种计划模式的局限性。

从实践上首先对计划经济提出否定的是50年代初的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模式。南斯拉夫人的初期探索是一个与斯大林集中模式有着根本区别的经济体制。之后涌现出一批能够独

立思考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家，他们在批判旧体制的同时，提出引进市场机制的改革方案。1962年苏联经济学家利别尔曼提出了运用利润企业生产的建议。此后，一般行政性分权改革的浪潮席卷苏联东欧各国。尽管各国改革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但基本方向是一致的：这就是扩大企业经营权限；减少中央指令性指标；引进市场机制；通过利润分成制刺激企业的活力。中央则更多地通过各项经济参数调节企业活动，从而迫使企业作出大致符合中央意图的决策。还须提到的，在60年代改革中产生的另一个计划经济模式即匈牙利模式。比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更深刻些。如取消了中央向企业下达指令性指标的作法，企业将根据自身利益作出自己的生产和分配的决策，而不再从中央得到生产计划指令，成本与利润对企业利益变得重要了。即使这样，我们仍然不能把匈牙利经济说成市场经济，原因是这种改革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改革。纵现60年代东欧国家的改革，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原有体制，政府从来也没有试图走向市场经济。改革也没有改变中央控制经济活动这个计划经济的本质。尤其是这种有限度的改革，遇到很大的阻力，主要是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霸主地位极力阻挠。东欧国家改革的不成功，表明坚持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

中国在1956年全面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不久，立即感到了它有很大的缺陷，提出了要对它进行改革的要求。早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陈云就根据指导经济工作的实践经验，阐述了计划和市场问题。他指出，“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

是计划生产的补充”。这里可以看到了他在70年代末期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的最初表达。得到共识，尔后不久，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并告诫全党和各级政府要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这事实上从另一个侧面考虑了计划和市场的问题。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最终在党内居统治地位，由于传统的排斥市场作用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作用及其强大的惯性影响，实践中并没有认真处理好这种关系。与此相应，理论上的探讨和研究亦未能正常展开。

早在1961年，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就提出过，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并不是在各级政府之间分权，而是要给企业以自主权。第一次提出：“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是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以及“要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的观点。但是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间，这种观点是被看成“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人们很难对此进行探讨，更谈不上改革思路的根本改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市场”以及“市场经济”讳莫如深。理论上的研究无疑是极不充分的，真正打破这一理论禁区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1978年下半年，我们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1979年初，陈云同志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主张允许国民经济中有一个部分为市场而生产，由市场机制来调节。这一主张在旧体制上冲破一个缺口，代表了认识上的进步。但是，当时尚未突破旧体制的基本框架，没有超越传统观念的束缚，只有一部分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主张按商品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实行计划指导下的

市场调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作出了郑重说明：

“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是我们党第一次用决议的形式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定下来。1980年国务院财委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采纳了这一主张，并作了初步的阐述。但当时这种阐述未被确认为改革的指导思想。

这一时期，理论界的讨论也十分热烈，在这之前，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已有讨论，甚至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理论上的进展，往往来自发展了的实践。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吸取了这些卓越的理论成果，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决定》的重大贡献，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作了深刻的说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特殊的条件，决定了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至此，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商品经济这个概念才取得了合法的生存权。基于马恩等经典作家曾设想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不再有商品经济，以及几十年社会主义的实践当中长期排斥市场调节，以至改革初期，我们承认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就是不能够接受商品经济这一概念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决定》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论断，可以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把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肯定了《决定》以来的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用更明晰、更规范的语言对之进行了总结与概括。在全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这种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要加强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这些提法比以前更为科学和准确了，大大不同于《决定》前的认识，以前的“主辅”原则不再体现其中，这种概括和总结把党中央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党的十三大报告，关于新的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的较为规范的表述，并不是党中央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认识的终结。时代在前进，认识在发展。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新概念，无疑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它具有推进历史的重大意义，但也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即它未能彻底解决计划与市场究竟何者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或主要手段问题，以致人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上不断发生摆动和分歧。人们仍然不能摆脱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是区别两种社会制度范畴标志的思想束缚，这又阻碍了人们去深刻认识市场机制在优化资源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一直是思想理论方面的禁区。即使在改革开放后，人们也只是强调要利用市场调节，或者使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不要说搞市场经济，即使是提“市场取向”，也被认为是想搞“资产阶级自由

化”。直至前不久，这种教条还束缚着人们思想，不仅影响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拓展，而且也影响到人们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正确把握。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而且应当搞市场经济的认识从改革开始就一直存在，并通过不同的形式反映出来。从改革一开始，对这一问题讲得很早、很明确，且始终如一的是邓小平。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等美国学者时就说过：市场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但也有不同。这些话当时大家并不知道。尔后，他对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论述，并运用生产力标准来观察，评价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1985年¹²月23日，邓小平在回答美国企业家代表团团长格隆瓦尔德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时说：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这当然是一个好办法，但多年的经济表明，光用这个办法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应该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样就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速生产力的发展。1989年6月，在极为严峻的政治局面下，邓小平仍然强调，要坚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不能变。针对着某些人把市场特别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把计划看作是社会主义固定的基本特征的偏见，1990年底邓小平又明确指出，理论上要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调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不控制？有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就是控制嘛！不要

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那回事。1991年，历史又处在关键时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面临严峻的考验。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正是春节前后，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时发表了一系列谈话。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便是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邓小平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些科学论断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传统观念，诊治了我们在市场和市场经济问题上常犯的恐资病，启发了人们从资源配置这一基本经济学观点出发，去全新地思考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问题。回溯历史，这些观点或说法从1979年以来的12年中，邓小平同志已多次讲过。这次只是再次重申，更集中、更系统地重申。之所以反复重申是因为尚未形成共识。原因在于有些人没搞懂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度怎样才能更好地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

作为谙熟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实事求是原则的邓小平，十几年中反复再三论述这一问题，并且改革的实践愈深入，他的论述愈直接和明确，这决不是即兴之言，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实践的深思熟虑。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要实行的商品经济，是一种充分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发达的商品经济，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显然，无论

人们愿不愿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被历史自然而然地推到了人们的面前。

我们党响应了这一历史要求，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一步调整和发展了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不久，1992年3月党的政治局会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江泽民在1992年6月9日中央党校的报告进一步指出：“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他还具体描述了新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根据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精神，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对报告稿做了重要修改，写出了第4稿。1992年10月18日，党的十四大通过《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批准了十四大报告并明确：“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通过组织程序在全党正式确立了。至此，党中央完成了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中的合理抉择。

个人的远瞩变成多数人的共识，会有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新认识逐步形成、发展、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经励了14年，用了14年时间，在全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是一件值得中国人民庆幸的大事。中国人民将依据它们去开辟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改革开放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经济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的时刻，提出我国经济

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偶然的。而是客观形势的需要，是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发展和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认识深化的结果。也就是，我国的市场经济问题本身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推进而尖锐地提出来的。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和现代化建设展开以后，解放生产力的使命并未终结，还需要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原有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才能促进生产力蓬勃发展。

我国原有的体制，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如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曾取得成功，使我国初步建成以重工业为中心和以三线建设为重点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复杂，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要求。其主要弊端，是决策过于集中，基本上用行政指令分配资源，排斥市场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压抑经济活力，阻碍了效益的提高。因此，改革原有体制和建立新体制，核心的问题在于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过去，人们对旧体制的根本弊病在哪里认识得并不深刻。过去常讲的所谓统得过多，管得过死，抑制了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企业的积极性，因此，总是在你管还是我管上做些文章，这只是事情的现象方面，而不是问题的本质。事情的本质在于没有跳出用预定计划来配置资源这种经济体制的框框，还未找到改革的正确目标和途径。我们在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都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

基本特征和显著特点。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既然计划机关对社会需要、技术和资源的情况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所有资源又都在社会掌握之下，我们完全可以编出一个最合理、能够保障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的计划，然后根据计划配置资源，一定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得最快、最好。可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事情并不像原来想象得那么简单。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任何一种生产关系、一种经济体制都是适合生产力的需要而产生、发展、消亡的。所以我们评价任何一种生产关系或经济体制的是非得失，不是根据道德的标准，主要标准应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从而能使人民生活得到迅速改善。为什么提出要用市场经济体制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这个问题，既不是一个信念问题也不是一个感情好恶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证性问题。要解答这个问题，就不要继续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抽象理论上纠缠。而是切实考察这两种运行机制在世界经济竞技场上进行历史的较量，说明它们各自在什么条件下是资源配置的更为有效的方式，以及从整体上说何者更为有效。

在经济发展史中，市场经济先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它要求各种社会经济资源能够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中自由流动，得到有效的配置，并能伸向国际市场。近代市场经济形成后，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但同时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激化起来。市场经济发展19世纪初，周期性经济危机开始出现，此后愈演愈烈，造成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等社会灾难。针对市场经济的这一重大弊病，各国政府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经济政策，走了两条不同